

## 圖之內外——清代臺灣輿圖的多重意涵

賴明珠

In and Out of the Maps :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Cartography of Taiwan during the Ch'ing Dynasty Lai Ming-Chu

### 摘要

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（1662-1795）是大清帝國向外大肆擴張，國勢最為強盛的黃金年代。隨著開疆闢土戰役的展開，以及統治政權的向外擴張，繪製地圖既能釐清疆域，又能具體標示出皇清管轄權的範圍，建構結合政治與文化的「視覺性」體制。17 世紀晚期臺灣被納入大清帝國版圖，之後地方統治官員及中央統治中樞，相繼運用傳統木刻墨印輿圖、彩繪卷軸輿圖，以及現代經緯地圖，將東南海隅被「馴化」的荒陬邊區顯影。在清廷採用各種形式製圖學所形塑的知識／權力結構中，被視為蠻荒邊域的臺灣，乃成為帝國主體「凝視」下的客體「他者」。效忠於帝國的製圖者，透過諮詢、想像或親身履勘，製造出各式的臺灣輿圖，賦予海疆臺灣多重的象徵意涵。滿清皇朝即是以支配者之姿，操控「視覺性」建制的輿圖，將被「客體化」、「差異化」的臺灣予以收編、定義和再現。

**關鍵字：**臺灣輿圖、視覺性、凝視、他者、再現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 壹、前言

17 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（VOC）佔領臺灣，為了航運、貿易的暢通與安全，乃運用現代精密儀器與技術，測繪臺灣海岸圖、港灣圖及大小比例地圖，臺灣因而在世界地圖中得以顯影（visualizing）。西方人測量臺灣的經緯地圖，既劃定了管轄疆域又「再現」（represent）霸權國家開拓貿易、統治殖民地的演變歷程。美國視覺文化學者瑪莉塔·史特肯（Marita Sturken）及莎莉·卡萊特（Lisa Cartwright）闡述「再現」理論為：運用「語言或影像」工具，替「周遭世界製造意義」。<sup>1</sup>而 17 世紀晚期統治臺灣的滿清帝國，亦透過書寫文字和視覺影像等再現系統，建構並定義特殊歷史、社會脈絡下的臺灣，並依循建制化「運作組織的規則和慣例」，操控著「再現系統」。<sup>2</sup>夏黎明說：「地圖是對周遭環境的一種圖式呈現」，故「地圖繪製是指透過一套簡化過程和符號系統，將地表或空間資訊載入儲存媒體，以便將真實世界轉譯成圖像給讀圖者的一種工具和過程」。<sup>3</sup>清朝時期，官方製圖者運用圖像符號及文字，標示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分布情形，並針對實際轄區地表現象進行統治現況的描述。對統治者而言，地圖即是「一種政策的陳述」，並具有一定的「政治意涵」。<sup>4</sup>而轄區外的生番之域，於統治初、中期，刻意避諱不述、不入圖，也呈顯出統治者消極的政治態度。

傳統中國繪製地圖大抵分為，「計里畫方」與「山水畫法」兩種。<sup>5</sup>「計里畫方」採定量製圖，繪圖者先在圖上按照一定比例畫成方格狀座標網，藉此控制地圖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離。例如明朝羅洪先《廣輿圖》及陳祖綬《皇明職方地圖》即為代表。「山水畫法」則是以山水畫筆法繪圖，傳統地方志書通常採用此形式製圖。<sup>6</sup>而兩種中國傳統輿圖畫法，無論是強調線條的「計里畫方」，或是洋溢藝術趣味的「山水畫法」，都和講究精確性的西方地圖在工具、技法及目的上不同。

運用經緯度與三角測量法的西洋製圖於明末傳入中國，並於康、雍、乾年間為皇室所借用，多次派遣傳教士及測量團隊展開全國性大地及地理測繪工作。其

*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*

<sup>1</sup> 瑪莉塔·史特肯、莎莉·卡萊特著，陳品秀譯，《觀看的實踐——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》，臺北市，臉譜，2009 年，頁 32。

<sup>2</sup> 同上註。

<sup>3</sup> 夏黎明，〈國家統治與知識生產：清代台灣地圖的繪製與區域發展〉，《海峽兩岸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》，廈門，廈門大學，2004 年，頁 118。

<sup>4</sup> 艾瑞克·霍布斯邦（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）著，黃煜文譯，《論歷史》，臺北市，麥田，2002 年，頁 224。

<sup>5</sup> 翁佳音、石文誠、陳佳慧，《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》，臺北市，國立臺灣博物館，2007 年，頁 47。

<sup>6</sup> 王庸，《中國地圖史綱》，北京市，商務印書館，1959 年，頁 31-32。

中，康熙 53 年（1714）澎湖群島與臺灣的實地測繪，在日後臺灣方志中即多次被提及。

本文嘗試藉由 18、19 世紀清廷運用傳統輿圖及現代地圖，形塑、繪製臺灣的過程，探索帝國如何將外海蠻荒邊域，轉化為具有「想像空間」及「權力視野」的視覺載體，以及其中所蘊含的象徵意涵。

## 貳、臺灣方志輿圖與彩繪輿圖

北宋年間（1098-1110）中國出現第一部歷史地圖集《歷代地理指掌圖》，總計 44 幅。其中，第 1 圖《流求》與第 27 圖《流求國》，都不是畫臺灣。<sup>8</sup>明萬曆 36 年（1608）《三才圖會》，「海南」北方畫了「琉球」；而萬曆 38 年（1610）《方輿勝略》，也畫了「大琉球」與「小琉球」。這些 17 世紀初期中國輿圖上出現的島嶼，依其地理位置也都難以斷定為臺灣。崇禎 9 年（1636）《皇明職方地圖》的《皇明大一統總圖》中，臺灣則被畫成北為「雞籠澹水」，中為「北港」，下連「澎湖」的三島相連形式。<sup>9</sup>可見從 11 世紀至 17 世紀前葉，歷代中國統治者對尚未劃入統治版圖的臺灣，不但缺乏地理空間認知，也沒有任何測繪紀錄。直到康熙 23 年（1684）臺灣納入版圖後，官方才開始將臺灣的地表及空間，以木刻方志輿圖及彩繪輿圖的形式，建構為「視覺性」（visuality）知識。<sup>10</sup>

### 一、臺灣方志輿圖

傳統方志在體例安排上，通常將輿圖放在書首，方便覽閱者一目了然，洞悉方志所載行政區域的範圍，以達到圖文互參的效果。王必昌（1704-1788）於乾隆 14 年（1749）編纂《重修臺灣縣志》說：「首繪圖，便覽也。圖先書後，自昔然也」。<sup>11</sup>可見方志於書首配置地圖乃是舊有慣例，目的就是便於統治者總覽轄區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sup>7</sup> 林天人，〈地圖——權力的視野、想像的空間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 304 期，2008 年 7 月，臺北市，頁 10。

<sup>8</sup> 吳密察、賴進貴、莊永明等著，〈地圖與臺灣——四百餘年來的臺灣地圖史〉，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，《地圖臺灣——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》，臺北市，南天，2007 年，頁 6。

<sup>9</sup> 同上註，頁 7。

<sup>10</sup> 吉莉恩·蘿絲（Gillian Rose）著，王國強譯，《視覺研究導論——影像的思考》（*Visual Methodologies: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*），臺北市，群學，2006 年，頁 7。

<sup>11</sup> 王必昌等編，〈凡例〉，《重修臺灣縣志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113 種，臺北市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 年，頁 17。

領域的地誌概況。

清朝時期官修臺灣方志，幾乎都會在書前插畫域內自然、人文地理圖。鳳山縣學廩生盧德嘉於光緒 20 年（1894）完稿的《鳳山縣采訪冊》中，評論清領以來臺灣方志輿圖繪製的要領與弊端，他說：

《漢書》〈地理志〉云：推表山川，是地理以山川為綱領，而城郭、村墟、津梁、塘汛、隘口附麗於其間者，……萬萬不能倒置。……凡繪圖，無論山名、水名、地名、村名，必須於四至交接之處，兩圖並書，庶使此圖可與彼圖逗合；此為最要。舊志於山則繪樹木，於水則繪波瀾，於美景則繪漁艇、浮屠，於營汛則繪煙墩、旗幟；此最可厭，今宜一切刪除。

12

盧德嘉先歸納方志輿圖都以山川為主軸，並運用「山水畫法」勾繪行政區域內自然地形、地貌及人文地物。他批評舊志輿圖，喜愛在山水、營汛等「節點」(nodes)，<sup>13</sup>添加樹木、波瀾、漁艇、浮屠、煙墩、旗幟等與地圖無關的景物，並提出應該刪除這類「可厭」裝飾性圖案的建議。盧氏之論反證了，雖然在 18 世紀初西方現代經緯測量法已傳入中國；但截至 19 世紀末方志輿圖繪製者仍偏愛使用傳統山水畫法製圖。

據統計，清代官修方志共有 18 部，<sup>14</sup>除了蔣毓英所撰第 1 部《臺灣府志》沒有輿圖之外，其餘 17 部於卷首都附有地圖。刊印於康熙 35 年（1696）高拱乾《臺灣府志》，卷首附有輿圖 5 幅：《臺灣府總圖》（圖 1）、《臺灣縣圖》、《鳳山縣圖》、《諸羅縣圖》（圖 2）及《澎湖圖》。<sup>15</sup> 張輿圖均採用山水畫法，技法雖然簡略又不精確，但卻是臺灣方志中最早附錄地圖者。之後，4 部府志、9 部縣志及 2 部廳志，也都以山水畫法搭配符號、文字，繪製行政區域圖或城池圖。（圖 3）只有同治 10 年（1871）付梓的《淡水廳志》，所附《淡水廳全圖》（圖 4）、《分圖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sup>12</sup> 盧德嘉，〈采訪案由〉，「附修志事宜十四條」，《鳳山縣采訪冊》（一）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73 種，臺北市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0 年，頁 12。

<sup>13</sup> 「節點」(nodes) 一詞乃借用美國學者喬治·柯利茲 (Reginald George Golledge, 1937-2009) 對空間環境中「初始地點」(initial position) 的詮釋。(賴進貴、黃清琦、葉高華，〈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——以 1878 年《全臺前後山輿圖》為例〉，《地理學報》第 42 期，2005 年 12 月，臺北市，頁 49。)

<sup>14</sup> 林士桓，〈臺灣清代方志研究——以府、廳、縣志為例〉，新北市，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9 年，頁 87、121、123-125。

<sup>15</sup> 高拱乾，《臺灣府志》，收入《臺灣歷史文獻叢刊》，南投市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，頁 1-15。

一～四》、《沿山各隘圖一～二》、《沿海礁沙形勢圖一～二》等山川輿圖，<sup>16</sup>則以「計里畫方」搭配符號及文字繪製，並清楚標示東西南北方位和經緯度數，乃是 17 部方志中唯一現代式的輿圖。

臺灣方志編輯群，係為服務最高統治者而成立，修志官紳基於政治動機，集體進行轄區內封域、規制、秩官、武備、賦役、典秩、風土、藝文等之文本書寫，並命畫工繪刻視覺性輿圖。方志輿圖是以行政疆域為描繪對象，並採用傳統山水畫法描繪轄區山川形勢、政軍建置及聚落的分布概況。<sup>17</sup>其技法表現大抵粗拙、簡率，但政治性喻意極強。它們既是帝國標識臺灣納入版圖的象徵，更是作為國家主權與領土範圍的重要憑證。<sup>18</sup>

## 二、臺灣彩繪輿圖

清領時期，除了以木刻雕版印製方志輿圖之外，康、雍、乾盛世及光緒年間，也留下數種以手工彩繪的臺灣輿圖，分別為國內外博物館、圖書館所珍藏。<sup>19</sup>設色敷彩臺灣輿圖較諸木版印製方志輿圖，多了繪畫色彩的表現，因而有「景觀式的地理圖」、「山水畫式的地圖」或「彩繪本卷軸地圖」的稱呼。<sup>20</sup>

本章節選擇以《康熙臺灣輿圖》、《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》、《臺灣地圖》及《臺灣前後山全圖》4 幅彩繪輿圖為視覺文本，嘗試探索清朝畫家描畫不同時期臺灣的動機與傳達的意涵。

### (一)《康熙臺灣輿圖》——政軍建置與民、番風俗並重

大約製作於康熙 38-43 年（1699-1704）的《康熙臺灣輿圖》，<sup>21</sup>描繪臺灣西

<sup>16</sup> 陳桂培，《淡水廳志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172 種，臺北市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3 年，頁 1-17。

<sup>17</sup> 劉廷祥，《我國方志地圖研究：以明代方志地圖為例》，臺北市，花木蘭文化工作坊，2005 年，頁 42-45。

<sup>18</sup> 洪健榮，〈知識 / 權力的空間——清代臺灣方志輿圖中的政治文化意識〉，「空間新思維——歷史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臺北市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8 年，頁 323。

<sup>19</sup> 科技部，《科技大觀園》，「飛覽古今——從古輿圖看家園」，快取版，<https://scitechvista.nat.gov.tw/zh-tw/PopularScience/C/8/10/1/237.htm>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
<sup>20</sup> 翁佳音、石文誠、陳佳慧，《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》，臺北市，國立臺灣博物館，2007 年，頁 47、51、55。

<sup>21</sup> 此圖原存於清宮內府，明治 35 年（1902）輾轉入藏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（今國立臺灣博物館）。翁佳音等依據山中樵論述，將其製作年代訂於康熙 38 至 43 年之間。（翁佳音、石文誠、陳佳慧，《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》，臺北市，國立臺灣博物館，2007 年，頁 15、26-27、39。）

部從南到北，一府、三縣的衙署、營盤、汛塘等政軍建置節點。(圖 5-1) 澎湖、臺灣西部有幾條橫直的陸路營兵和水師巡哨的紅色防線。而北起「八里分社」，南至「沙馬岐頭」的虛線，則是人和牛車行走的南北縱貫大路。此地圖最特別之處為，描繪漢人與平埔族的風俗圖像。<sup>22</sup>從圖繪內容來看，《康熙臺灣輿圖》明確標示清初臺灣地理景觀與政軍設施，具有輿圖的實用功能；並將漢、番風俗與人文景觀入圖。此種地圖與風景兼容的表現手法，是否受到 16、17 世紀歐洲地圖影響，尚待更詳細的比對與查證；<sup>23</sup>不過東、西方在表現風格上，還是各具特色。歐洲地圖上所描繪的建築、風俗或人物，幾乎都畫成小插圖 (vignettes)，具有濃烈的裝飾效果，目的在激發顧客的購買慾。然而《康熙臺灣輿圖》顯然強調的是采風紀實，因而圖面上出現的漢人村落，可見磚瓦建造的民宅、水田、旱田、牛車與馬匹。「紅毛樓」與「紅毛城」之間的海灣，船隻與牛車忙碌穿梭。平埔族的茅草屋，周圍栽植「椰樹」或「修竹」。<sup>24</sup> (圖 5-2) 而下淡水溪以南，大肚溪以北，則出現手執弓箭、標槍，追逐鹿群或野兔的平埔番人，其紀實意義顯然超過裝飾作用 (圖 6-1、圖 6-2)。《康熙臺灣輿圖》是目前所知最早運用青綠設色及細膩筆法，生動地呈現 17、18 世紀更迭之際，臺灣山川地理與人文社會狀態的巨幅彩繪輿圖。

從內府流出來的《康熙臺灣輿圖》，<sup>25</sup>是由宮廷畫師所執筆。圖中標示了臺灣自然地形、行政兵備部署、巡哨防線、南北大路、民番聚落等重要政軍資訊，繪製目的是作為皇帝御覽及滿官擘劃治理新附版圖之用。圖上註記的文字皆採漢文楷書，不僅標誌地名，同時於地名左下方註記說明文字，內容比起一般方志輿圖

<sup>22</sup> 翁佳音、石文誠、陳佳慧，《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》，臺北市，國立臺灣博物館，2007 年，頁 50。

<sup>23</sup> 16、17 世紀的歐洲地圖，如法蘭克福雕刻家特奧多雷·德·布里 (Theodor de Bry, 1528-1598) 1598 年《澳門圖》，可能是歐洲人最早以中國城市為主題的地圖。《澳門圖》將宗教建築及城市居民搭船、捕魚、騎馬、坐轎等日常生活描繪入圖。英國製圖家約翰·斯皮德 (John Speed, 1542-1629) 1626 年《中華帝國》(The Kingdome of China)，及荷蘭地理學家威廉·布勞 (Willem Blaeu, 1571-1638) 1635 年《亞洲圖》(Asia Nnoviter Delineata)，也都在地圖上方描繪城市建築、港口風光、風俗人物，兩側還以穿著獨特民俗服飾的單一或成對男女作為圖面上的裝飾物。(以上諸圖，請參看蕭宗煌、呂理政統籌策劃，《艾爾摩莎：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》，臺北市，國立臺灣博物館，2006 年，頁 26；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，《地圖臺灣——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》，頁 110；石守謙主編，《福尔摩沙——十七世紀的臺灣、荷蘭與東亞》，臺北市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3 年，頁 17。)

<sup>24</sup> 《臺灣府志》〈風土志〉云：「番屋高地四、五呎，深狹如舟形，梁柱皆畫五采；……後多植椰樹、修竹，暑氣莫能入。」(高拱乾，〈風土志〉，《臺灣府志》卷 7，收入《臺灣歷史文獻叢刊》，南投市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，頁 188。)

<sup>25</sup> 翁佳音、石文誠、陳佳慧，《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》，臺北市，國立臺灣博物館，2007 年，頁 15。

更加詳實而豐富。此件彩繪輿圖和方志輿圖一樣，皆採上東、下西、左北、右南的橫軸圖式。但對後山噶瑪蘭社及傀儡番的所在空間，則以虛位手法再現。例如，標註「在此山後」、「人跡不到」、「在此山後石洞內」等具有危險暗喻的文字，（圖 6-3）彰顯中央山脈另一邊為蠻荒化外之域。統治者選擇性地將後山番地劃為境外之地，不予定位，也不入圖。這種施以空白、隱藏或暗喻的手法，實具有視覺性的「高度象徵意涵」（highly metaphorical）。<sup>26</sup>

## （二）雍正朝《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》——藝術化的紀實輿圖
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《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》，是目前所見面積最大的臺灣地圖。據莊吉發的考證，此圖大約製作於雍正元年至 13 年（1723-1735）間，<sup>27</sup>亦採上東、下西橫軸形式，左起基隆外海「花矸嶼」，右迄恆春半島「沙馬磯頭」。全圖以中央山脈西邊一府四縣之山川、官署、防汛、庄社為描繪重點，而未被畫入的東海岸，只在山峰上書寫「山後蛤仔難」、「山後卑南覓社」、「傀儡大山」等文字，標識著被帝國治權排除於山後的化外番界。

此圖最大的特點有二，一、1714 年清廷在澎湖、臺灣進行履勘實測，繪圖者或許取得宮中詳實的測繪資料，因而增加許多澎湖群島及臺灣西海岸的山川與人文建置地名，因而且其方位與地點相對較為準確。二、臺北盆地以大湖形狀顯像，「雷里社」（今南萬華鄰新店溪）一帶，則註明「可泊大船」。這實為康熙 33 年（1694）臺北發生芮氏 7 級地震，土地瞬間液化，淡水河河水入侵盆地形成大湖的紀實圖像。<sup>28</sup>郁永河（1645-?）《裨海紀遊》即曾記載：「甲戌（1694）四月，地動不休，番人恐怖，相率徙去，俄陷為巨浸」。<sup>29</sup>故此圖以肖真的手法，再現當年地震所造成的地形變貌。

本圖以傳統山水畫法繪製，大海、河流為淺綠色，海面以鱗狀波紋標示，河流以黑色雙線勾勒；西岸陸地以淡黃色敷染，近山用褐灰色暈染，中央山脈渲染為淺藍色，並以線條勾勒出山岳的外形；山頂及山麓再以層次井然的綠、黑色表

<sup>26</sup> Cordell D. K. Yee. "Concluding Remarks: Foundations for a Future History of Chinese Mapping." in J. B.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.. *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. 2, Book 2: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*. Chicago: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, 1994, p. 228.

<sup>27</sup> 莊吉發，〈錦繡河山——臺灣輿圖的繪製經緯〉，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主編，《故宮臺灣史料概述》，臺北市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5 年，頁 3。

<sup>28</sup> 謝英宗，〈康熙臺北湖古地理環境之探討〉，《地理學報》第 27 期，2000 年 6 月，臺北市，頁 85-95。

<sup>29</sup> 郁永河，《裨海紀遊》，南投市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4 年，頁 23。

現林木與植被的空間距離。原圖楷書秀逸，設色淡雅，用筆穩健，結構清晰，洵為清朝臺灣輿圖中藝術性表現甚高的紀實地誌圖。(圖 7)

### (三) 乾隆朝《臺灣地圖》——盛世華麗山水畫輿圖

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另一件輿圖，乃乾隆時期的《臺灣地圖》。莊吉發考證其製作時間「當在乾隆中葉」，另一說則為乾隆 21-24 年 (1756-1759) 間。<sup>30</sup>此圖描繪中央山脈以西府城、縣城等行政建置，並呈現全臺山川形勢、道路里程、巡守塘汛和駐防營衛等防衛資訊。除了漢人庄、街、厝之外，已開墾田地標誌「田」字，就連平埔番及恆春半島部分瑯嶠生番社名及分佈情形，亦詳加註記與標示位置。至於山後「哈仔蘭三十六社」、「崇爻十二社」、「傀儡山生番二十七社」、「卑南覓生番七十二社」，以及內山「水沙連三十六社」等，則於畫面空白處，以楷體書寫社名及歸化時間，但並未在圖面上定位標識。顯示即使在 18 世紀中期乾隆盛世，宮廷畫師繪製輿圖時，依然視後山生番為未馴化的域外蠻民。而已歸化的後山、內山及南端兇猛生番，頂多也只在輿圖邊緣空白處以文字註明，實際上也沒有入畫標位。

此圖運用傳統線條與符號，標識並區分漢庄與番社、道鎮營盤與汛塘、海流與山岳。府城、縣城、竹塹城及大雞籠城等政軍設施，則依據歷史進程，或畫成竹牆，或畫成石造城牆。城內官署、廟宇及其他人文建築，則以符號、文字標示。全幅採山水畫法，臺江內海及淡水河則舟楫輻輳，並特別以線條勾勒填上鮮艷紅、黃色彩。全圖形塑出昇平盛世、華麗明亮的氛圍，再現為乾隆盛朝的政治地理圖像。(圖 8)

### (四) 光緒朝《臺灣前後山全圖》——新納後山扭曲的認知空間

清朝治臺，採民 / 番分治、生番隔離的政策。雍正皇帝曾在官員奏摺上，硃批曰：「朕諄諄訓誨，但當劃清界限，使生熟番夷及內地百姓，各安生理，兩不相侵，始可免意外之虞」。<sup>31</sup>甚至標註可資辨識的「番界」線，以界碑、土牛堆、

<sup>30</sup> 莊吉發，〈錦繡河山——臺灣輿圖的繪製經緯〉，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主編，《故宮臺灣史料概述》，臺北市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5 年，頁 4；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者，則將此圖繪製時間定於「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 (1756-1759) 年間」。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〈典藏精選〉，[http://theme.npm.edu.tw/selection/Article.aspx?sNo=04001051#inline\\_content\\_intro](http://theme.npm.edu.tw/selection/Article.aspx?sNo=04001051#inline_content_intro) (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)

<sup>31</sup> 此係雍正 7 年正月初三，臺灣吏科給事中赫碩色及監察御史夏之芳奏摺之後的硃批文字。參

土牛溝或望樓等設施，劃出不可逾越的民／番分界線。<sup>32</sup>我們從上述 3 件康、雍、乾臺灣輿圖，即可看出這種將內地遷徙漢民與本地生、熟番隔離，分層管理、劃界區隔的統治策略。將未歸順的臺灣生番族群排除於輿圖之外的作法，一直要到同治 13 年（1874）「牡丹社事件」爆發後，清廷才「放棄封山禁令，改為『開山撫番』」政策，<sup>33</sup>而後山番界才得以被置屯、設官、丈量並畫入輿圖中。

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《臺灣前後山全圖》，是福建候補同知李聯琨奉巡撫李明墀（1823-1886）之命，赴臺考查「新設府廳縣城」、「新開后山南北中三路」，以及「瑯嶠之恆春縣等處之地名」後所畫。根據圖上李聯琨的述言：「隨山履勘，深入不毛之地五十餘日，日有筆記。其未經之處，或照各營錄報，或詢諸曾經該地之人。按地增入圖中」。<sup>34</sup>足見李聯琨繪製此圖時並未全部履勘，故對實質環境的掌握，仍有「主觀」、「不完整」、「扭曲」的空間認知。<sup>35</sup>

此圖完成時間大約在光緒 6 年（1880），原圖標示二府（臺灣、臺北）、八縣、四廳、澎湖列島和周邊島嶼的地理位置，以及城鎮村社的分佈情況。<sup>36</sup>中央山脈因仍缺乏履勘資料，故依舊採空白呈現。東西沿海及島嶼，則以文字註記水路里程、港灣、地形險要及民情土俗等概況。圖中道路以紅色虛線標誌，山脈、河川以符號標示；山峰淡染藏青色，陸地渲染淺綠色，河流及海岸則以橄欖綠著色，整體表現沉著典雅的色感。（圖 9）

李聯琨的述言，此圖的製作乃肇因於「海上兵事」（指「牡丹社事件」），而臺灣為「聖澤涵濡」的「荒服地」，坐擁「東南海防」咽喉，「足以牽制東洋各國」，故綜覈履勘，繪製成《臺灣前後山全圖》。李氏的自敘反映出，晚清時期在外邦競逐下，為了彰顯「臺灣全島莫非王土」的一統意識，<sup>37</sup>因而此圖特別著重於描

見雍正，《硃批諭旨》，四庫全書本，卷七十二，維基文庫，[https://zh.m.wikisource.org/zh-hans/硃批諭旨\\_\(四庫全書本\)/卷\\_072](https://zh.m.wikisource.org/zh-hans/硃批諭旨_(四庫全書本)/卷_072)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
<sup>32</sup> 石文誠，〈帝國的邊陲論述——以清代臺灣圖像為例〉，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》，創刊號，2010 年 10 月，臺南，頁 23。

<sup>33</sup> 賴進貴、黃清琦、葉高華，〈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——以 1878 年《全臺前後山輿圖》為例〉，《地理學報》第 42 期，2005 年 12 月，臺北市，頁 53。

<sup>34</sup> 《臺灣前後山全圖》上面有李聯琨以楷書書寫繪圖的原因、內容等文字。參見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，〈數位方輿〉，「主題單元」，『地方行政區圖』，《臺灣前後山全圖》，<http://digitalatlas.asdc.sinica.edu.tw/map.jsp?id=A103000058>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
<sup>35</sup> 賴進貴、黃清琦、葉高華，〈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——以 1878 年《全臺前後山輿圖》為例〉，《地理學報》第 42 期，2005 年 12 月，臺北市，頁 52。

<sup>36</sup>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，〈數位方輿〉，「主題單元」，『地方行政區圖』，《臺灣前後山全圖》，<http://digitalatlas.asdc.sinica.edu.tw/map.jsp?id=A103000058>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
<sup>37</sup> 李聯琨於輿圖右側旁註中，對主要地標、節點、地方民俗，以及製圖的緣起、功能、過程和效用都詳實地以文字敘述說明。

繪新設府縣廳城，新開後山港灣，以及周圍海島等具有行政或海洋戰略地位的節點。然而實際核對原圖，其標示的地標、路徑或地理位置甚為簡略，並出現不少錯誤與偏差的認知空間。

### 三、小結

畫工印製的黑白木刻方志輿圖和《臺灣前後山全圖》，多以樹木、波浪、線條等標誌符號，搭配說明性文字，標示出與時並進的行政轄區之山川、政軍設施和聚落的現況，清楚地界定了清朝地方行政權力與教化所及的有效範圍。宮廷畫家所畫的大型長卷彩繪輿圖，則將臺灣自然地景、政軍建置及民俗生活圖像化，呈現出活潑生動的地誌圖。紀實性強烈的彩繪輿圖，既具有施政參考的實用性，又擁有供人鑑賞的藝術性之雙重功能。由於彩繪輿圖分別是在不同皇帝時期所繪製的全臺性地誌圖，因而被賦予再現帝國領土範疇與治權實質擴張的政治象徵意涵。

### 叁、18 世紀現代測繪的臺灣輿圖

中國地圖學從西晉裴秀（224-271）創制「六法」原則後，一直到明嘉靖年間羅洪先出版《廣輿圖》，才將輿圖的發展推至巔峰。<sup>38</sup>明萬曆 12 年（1584），耶穌會教士利瑪竇（1552-1610）應嶺西按察司副使王洋之求，翻刻刊印《山海輿地全圖》；<sup>39</sup>不但開啟中國對「地圓說」及世界地理的認識，同時也將西洋科學製圖技術傳入中國。<sup>40</sup>清朝時期，康、雍、乾三朝都曾進行全國疆域領土履勘測繪。康熙首開聘任擅長天文觀測、三角測量法<sup>41</sup>及梯形投影法製圖技術的西洋傳教士，<sup>42</sup>遠赴內地 18 省、東北地區及邊疆藩部，進行大地測量，並完成《皇輿全

<sup>38</sup> 張哲嘉，〈明代方志中的地圖史料〉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稿，<http://project.ncnu.edu.tw/jms/wp-content/uploads/2015/10/report2003ChangCC.pdf>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
<sup>39</sup> 郝曉光、呂健、薛懷平、覃文中，〈《山海輿地全圖》的復原研究〉，《同濟大學學報》第 29 卷第 10 期，2001 年 10 月，上海，頁 1159-1160。

<sup>40</sup> 張哲嘉，〈明代方志中的地圖史料〉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稿，<http://project.ncnu.edu.tw/jms/wp-content/uploads/2015/10/report2003ChangCC.pdf>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
<sup>41</sup> 康熙朝西洋傳教士運用三角測量法進行全國國土測量時，使用了望遠鏡、象限儀、半圓儀、比例尺等科學儀器，完成 1:1,400,000 比例的《皇輿全覽圖》及各省區分圖的繪製。之後這些現代化的測量儀器，則被陳列在養心殿、暢春園等皇室寢宮及御所中。（潘吉星，《中外科學之交流》，香港，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3 年，頁 447-448。）

<sup>42</sup> 孫喆，《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》，北京市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，頁

覽圖》的繪製。當時滿清官員與西洋傳教士所組成的測量隊，也曾渡海到澎湖、臺灣進行實地履勘與測繪。這是自 17 世紀荷蘭、西班牙之後，西方人再度以現代製圖技術勘丈、繪製臺灣地圖。

耗時將近 10 年，結合大批中外人員完成的《皇輿全覽圖》，日後成為雍正、乾隆全國輿圖擴充版的參考根據。而臺灣方志中，也屢次提及此次的地理測繪。以下將藉由分析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測繪目的、法國耶穌會士來臺測繪、輿圖文本的西傳，以及臺灣在《皇輿全覽圖》與西方輿圖中的再現等議題，探討臺灣地圖在《皇輿全覽圖》發展系脈所蘊藏的多重意涵。

### 一、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測繪目的

康熙是清朝第一位主持全國輿圖測繪的皇帝。他於《皇輿全覽圖》初版刊印後第 3 年（1720）說：

朕於地理，從幼留心，凡古今山川名號，無論邊徼遐荒，必詳考圖籍，廣詢方言，務得其正，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。凡大江、黃河、黑水、金沙、瀾滄諸水發源之地，皆目擊詳求，載入輿圖。<sup>43</sup>

《皇輿全覽圖》的製作固然與康熙個人對地理學的熱中有關，而康熙 28 年（1689）中俄簽訂「尼布楚條約」，康熙深刻體悟到中國對東北地區地理知識的匱乏，更促使他決心以科學實測方法勘丈、繪製大清版圖。<sup>44</sup>康熙 36 年（1697）準部噶爾丹平定後，聖祖於 47 年（1708）諭令西洋傳教士及官員，攜帶儀器分赴東北、蒙古及內地各省進行測量。同時咨文各省督撫、將軍及地方官員，提供測量團隊的需求。<sup>45</sup>當時清廷派遣法國傳教士白晉（Joachim Bouvet, 1656-1730）、雷孝思（Jean Baptiste Régis, 1663-1738）、杜德美（Pierra Jartoux, 1668-1720）及日爾曼神父費隱（Xavier-Ehrenbert Fridelli, 1673-1743）等人，分赴各地進行履勘與測繪，

265。

<sup>43</sup> 覺羅勒德洪等總裁，《聖祖仁皇帝實錄》卷 290，康熙 59 年 11 月辛巳，頁 2b-3a；引自李孝聰，〈記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測繪及其版本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 30 卷第 1 期，2012 年秋季，臺北市，頁 77。

<sup>44</sup> 孫喆，《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》，北京市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，頁 30。

<sup>45</sup> 潘吉星，《中外科學之交流》，香港，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3 年，頁 446。

<sup>46</sup>完成的草圖則由當地巡撫指派專人送至皇帝所在之地，以俾天子能掌控整個繪製過程與成果。<sup>47</sup>

在康熙皇帝的策畫與指揮下，《皇輿全覽圖》終於康熙 56 年（1717）完成木版初刻本，共計有總圖 1 幅，分省和地區圖 28 幅。<sup>48</sup>英國學者李約瑟（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, 1900-1995），稱譽此圖是：「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，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、更精確」。<sup>49</sup>（圖 10）德國漢學家傅吾康（Franke Wolfgang, 1912-2007）則說：「直至今日，東方地圖之繪製及出版，都還是用這份地圖作依據」。<sup>50</sup>可見康熙皇帝所推動的全國輿圖測繪工程，不但藉由現代天文、曆算、數學等專業知識，確立大清帝國的疆界與國土。同時也透過版圖的界定，以及北京本初子午線的設定等「視覺性」建制，傳遞中國乃東方陸權盟主，足以和西方海權國家抗衡的政治象徵意涵。

## 二、1714 年法國耶穌會士來臺測繪

17 世紀晚期臺灣被納入清朝版圖並隸屬於福建省。首次全國性輿圖測繪，當然必須克服險惡海象、渡洋履勘，以宣示對斯土斯民的統轄權。那麼是誰渡過黑水溝來臺實地測勘呢？

臺灣方志中對皇朝派人來臺測繪，時有提及。《諸羅縣志》（1717）〈封域志〉曰：「欽差大人繪畫地圖，勘丈里數」，又說：「茲卷或躬親遊歷、或遣使繪圖」。<sup>51</sup>《重修鳳山縣志》（1764）云：「按康熙五十三年，上命大人涉波濤、歷險阻，親按地形，勘定疆界，輿圖已登天府」<sup>52</sup>；《續修臺灣縣志》（1807）則說：「康熙五十五年欽差丈量」<sup>53</sup>。上述方志中，對來臺勘丈繪圖者，僅稱「欽差大人」、「使」、「大人」、「欽差」，並未明確記載人名。方豪 1949 年撰寫〈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〉一文，引用馮秉正（Moyriac de Mailla, 1669-1748）1715 年 8 月從江

<sup>46</sup> 李孝聰，〈記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測繪及其版本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 30 卷第 1 期，2012 年秋季，臺北市，頁 57。

<sup>47</sup> 同上註，頁 65。

<sup>48</sup> 同註 46，頁 72。

<sup>49</sup> 李約瑟，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第 5 卷第 1 分冊，北京市，科學出版社，1976 年，頁 235。

<sup>50</sup> Franke Wolfgang 著，胡雋吟譯，〈評《康熙皇輿全覽圖研究》〉，《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天津市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2 年，頁 672；引自潘吉星，《中外科學之交流》，香港，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3 年，頁 447、453。

<sup>51</sup>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，卷 1，〈封域志〉，南投市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，頁 6、17。

<sup>52</sup> 王瑛曾，《重修鳳山縣志》卷 1，〈輿地志〉，南投市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，頁 8。

<sup>53</sup> 謝金鑾，《續修臺灣縣志》卷 1，〈地志〉，收於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140 種，臺北市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 年，頁 27。

西寫給寇羅尼亞 (P, de Colonia) 神父的信，<sup>54</sup>信中馮秉正提及他和「雷孝思、德瑪諾 (Romain Hinderer, 1668-1744)」在「一七一四年四月三日」，由「皇帝領派的四位滿官」伴隨，從「廈門上船」，並在「十五艘戰船」護送下，航經金門、澎湖群島，<sup>55</sup>最後於 4 月 16 日中午「駛進臺灣港」。之後，「整整化 (花) 了一個月的時間以測繪這島上屬於中國部分的地圖」。<sup>56</sup>方豪因此主張，來臺測繪的「欽差大人」是雷孝思、馮秉正及德瑪諾 3 人。<sup>57</sup>他們於 1714 年 4 月 16 日搭船進入臺灣 (安平) 港，之後花了一個月的時間，測繪「屬於中國部分」，但「東部只有蕃人居住：那地方多山，沒有開墾，並且野蠻」，<sup>58</sup>故測繪隊伍並未越界勘查，而輿圖最後則採留白方式呈現。

李孝聰引用江寧巡撫張伯行康熙 52 年 (1713) 奏摺：

康熙伍拾貳年伍月拾柒日，准兵部咨，奉旨往河南、江南畫輿圖去的官，拜唐阿、西洋人不必回來，就從彼處往浙江周 (舟) 山等處、福建臺灣等處畫去。<sup>59</sup>

說明完成「河南、江南」輿圖測繪後的雷孝思、馮秉正及德瑪諾 3 人，<sup>60</sup>隨即馬不停蹄和滿清執事人員「拜唐阿」，<sup>61</sup>前往浙、閩、臺進行勘繪。綜合馮秉正信函，以及《天下輿圖總摺》說：「康熙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，奉旨交來有度數福建全省圖一張」<sup>62</sup>來看，3 位法國耶穌會士大約是在 1714 年潤 5 月中下旬完成臺灣履勘測繪，隨即將臺灣與福建合併騰繪為地圖，並於同年 9 月 20 日之前上呈福建省全圖。(圖 11)

<sup>54</sup> 方豪，〈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〉，國家圖書館藏「羅剛教授遺書」抽印本，1949 年，頁 38。

<sup>55</sup> 同上註，頁 39-40。

<sup>56</sup> 同註 54，頁 41。

<sup>57</sup> 同註 54，頁 31。

<sup>58</sup> 方豪，〈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〉，國家圖書館藏「羅剛教授遺書」抽印本，1949 年，頁 42。

<sup>59</sup> 李孝聰，〈記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測繪及其版本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 30 卷第 1 期，2012 年秋季，臺北市，頁 59。

<sup>60</sup> 同上註，頁 64。

<sup>61</sup> 「拜唐阿」是滿文譯名，有執事人之意。(杜家驥、李然，《嘉慶事典：清史事典 7》，臺北市，遠流，2006 年，頁 90。)

<sup>62</sup> 李孝聰，〈記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測繪及其版本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 30 卷第 1 期，2012 年秋季，臺北市，頁 60。

### 三、《皇輿全覽圖》的西傳

《皇輿全覽圖》木刻初版於 1717 刊印，但方豪認為銅版輿圖是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（Matteo Ripa, 1682-1746）1724 年返歐後所雕。<sup>63</sup>而白鴻葉、李孝聰則根據馬國賢回憶錄，認為他是在康熙 1719 年的諭令下，依據測繪原圖製作 44 塊銅版，最後再拼接印製成完整的中國地圖。<sup>64</sup>杜赫德（Jean-Baptiste Du Halde, 1674-1743）所編纂《中國帝國和蒙古地理、歷史、編年史、政治與自然情況的概述》一書，附有《中國總圖》、《中國與中國韃靼及西藏總圖》（圖 12）和 15 幅中國省圖，則是商請法國知名製圖師唐維爾（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'Anville, 1697-1782），參考《皇輿全覽圖》雕印。<sup>65</sup>此書於 1734 年在巴黎出版，3 年後（1737）唐維爾又增補歐洲人東來亞洲沿途所記資料，修訂成《中國、蒙古與西藏新地圖》（*Nouvel Atlas de la Chine,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*）於海牙出版。<sup>66</sup>日後歐洲印製或出版中國全圖、區域圖或分省圖，大抵都是依據唐維爾的地圖重製。換言之，1708 至 1717 年西洋傳教士為大清帝國履勘繪製的《皇輿全覽圖》，乃成為 18 世紀歐洲人繪製東方海、陸輿圖的基準範本。

### 四、《皇輿全覽圖》與 18 世紀西方輿圖再現的臺灣

《皇輿全覽圖》一反方志、彩繪輿圖常用的上東、下西橫軸圖式，改採上北、下南直軸形式。臺灣被畫在福建省東南沿岸外海，依緯度高低，從北至南標示出西半部重要的行政衙門、平埔番社及古城堡所在位置。西洋耶穌教士足跡未到的東部海岸則留白。山岳與河流以符號標誌，僅最重要的河川標示出名稱，而山岳也只有標幟大岡山、小岡山、木岡山及傀儡山，其他山岳則省略不刊印名稱。《皇輿全覽圖》雖然標榜，運用現代科學測量技術勘丈測繪全國性大地與各省行政轄區。但受限於清朝的治權，許多化外邊區，如：臺灣東部後山，以及西藏、新疆、貴州及廣西等地，西洋傳教士並未入境履勘，因而全覽圖中存在許多空缺。這些

<sup>63</sup> 方豪，《中西交通史》，長沙，嶽麓書社，1987 年，頁 865、868；引自劉亞軒，〈清初來華傳教士馬國賢與中西美術交流〉，融匯島，

<http://rhd361.com/special/news?id=7de4f06919374d089bd87e3c12a89feb>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
<sup>64</sup> 白鴻葉、李孝聰，《《皇輿全覽圖》的繪製》，北京，國家圖書館，2014 年，頁 77。

<sup>65</sup> 韓昭慶，〈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〉，《清華大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第 6 期，2015 年，北京市，頁 131-132。

<sup>66</sup> 李孝聰，〈記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測繪及其版本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 30 卷第 1 期，2012 年秋季，臺北市，頁 78；*Nouvel Atlas de la Chine,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*（中國、蒙古與西藏新地圖），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（法國國家圖書館），<http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tv1b53096745m>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
留白的地帶，在雍正實行「改土歸流」，乾隆平定準噶爾叛亂之後，西北、西南地區方陸續進行丈測，並於繪製《雍正十排圖》、《乾隆十三排圖》時增補，才讓擴張中的大清帝國版圖愈來愈完整。<sup>67</sup>但臺灣東部一直到帝國晚期，依然處於不完整、被扭曲的認知空間。(圖 13)

18 世紀西方製圖師繪製臺灣地圖時，若承襲《皇輿全覽圖》系統，幾乎都用簡略方式呈現。例如馮秉正帶回歐洲的《康熙皇帝命令下實測中華帝國隸屬下之臺灣地圖》，只用法文標識幾個府、縣、古城堡、澎湖群島及小琉球等重要節點。中央山脈標示「limites」(界線)，山脈以東則空缺不畫，象徵該地是帝國治權未逮之區。(圖 14) 杜赫德編輯的書及唐維爾在海牙出版的書，福建省圖中的臺灣(圖 15)，也都依據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模式虛化臺灣東海岸。

然而 18 世紀部分歐洲地圖繪製者，也有不同的作法。例如，荷蘭牧師瓦倫第恩(Francois Valentijn, 1662-1727)《新舊東印度誌》(*Oud en Nieuw Oost-Indiën*) 的《福爾摩沙島與漁翁群島圖》；<sup>68</sup> (圖 16) 荷蘭製圖師約翰尼斯二世·范·克倫(Johannes II van Keulen, 1704-1755) 繪製的《廣東、福建與福爾摩沙島》海圖；<sup>69</sup> 法國海軍製圖師貝林(Jacques Nicolas Bellin, 1703-1772) 繪製的《福爾摩沙島與中華沿海局部圖》(圖 17) 等。這些以航海為目的世界地圖，描繪臺灣西部時，重要地標與河流乃參考 1717 年法國傳教士測繪圖；但對「所知甚少」的東岸，則參酌 17 世紀荷、西人的測繪圖，將東半部原本空缺的河流、島嶼及地名標示出來。<sup>70</sup> 這些 18 世紀歐洲人繪製的臺灣海圖，共通特色是將秀姑巒溪口哆囉滿(Toloman)一帶畫成 3 個上下相鄰小島。<sup>71</sup> 可見即使測繪資料不完整或不完全準確；但為了符合航海需求，西方製圖師仍參酌前一世紀歐洲臺灣統治者的測繪圖，再現福爾摩沙的地理形貌。

## 五、小結

耗費 10 年完成的《皇輿全覽圖》，三位法國耶穌會士花了 1 個月時間，踏勘納入清朝版圖已 30 年的臺灣西半部及澎湖群島。至於未開墾且野蠻的東半部，

<sup>67</sup> 韓昭慶，〈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〉，《清華大學學報》(哲學社會科學版) 第 6 期，2015 年，北京市，頁 123、130、136-137。

<sup>68</sup> 呂理政、魏德文主編，《經緯福爾摩沙——16-19 世紀西方繪製臺灣相關地圖》，臺北市，南天，2006 年，頁 83。

<sup>69</sup> 同上註，頁 87。

<sup>70</sup> 同註 68，頁 89。

<sup>71</sup> 同註 68，頁 101。

測量隊伍並未涉足。我們從雷孝思、馮秉正、德瑪諾測繪的《福爾摩沙島圖》、唐維爾的《福建省圖》及貝林的《福爾摩沙島與中華沿海部分圖》等，可以看出受《皇輿全覽圖》影響的歐洲製圖師，都以準確但擇要的紀實手法，呈現治權所及的臺灣西邊及澎湖群島。至於治權未逮、未經履勘的東半部，歐洲製圖師或遵循《皇輿全覽圖》採留白法，以暗示地圖外的東部乃為教化未及的蠻荒之域；或參考前一世紀荷、西測繪圖，將臺灣東部再現為真實與想像合併的地圖。整體來看，歐洲製圖師所繪製的臺灣地圖，其地理資訊都皆甚為精準、簡要，但對實際山川、政軍及聚落等地理誌內容的轉譯，則不如方志輿圖及彩繪輿圖來得豐富而充實。

## 肆、結論

17 世紀初期，中國東北地區的狩獵民族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國。之後歷經兩百多年的繁盛，於 19 世紀初期漸趨衰頹。康、雍、乾三朝（1662-1795）是滿清帝國向外擴張，國勢最為強盛的黃金年代。隨著開疆闢土諸多戰役的展開，以及統治政權的向外拓展，繪製地圖乃能釐清疆域，並具體標誌出皇清帝權管轄的範疇。而結合政治與文化所建構的「視覺性」體制，亦藉由二度空間的輿圖，再現帝國輝煌的統治功勳。

17 世紀晚期臺灣被納入大清帝國版圖，之後地方統治官員及中央統治中樞，相繼運用傳統木刻墨印方志輿圖、彩繪卷軸輿圖及現代經緯輿圖，顯影東南海隅被「馴化」的荒陬邊區。在開拓疆土的歷程中，大清統治者除了以見聞錄、遊記、方志等文本，記錄臺灣的自然地理與人文景觀；並命令輿圖繪製者，運用文字、符號、圖案、留白及山水畫等各式技法，分類、標示、再現臺灣前山與後山的「馴化」程度。同時巧妙地在各種地圖的繪製中，區劃疆域的內／外，將統治者主體的想像與權力慾望轉化為圖面中蘊含象徵的意涵。誠如鄧津華所論，這種地理再現是一種「文本紀錄」和「親眼見證」的「雙重權威結構」。<sup>72</sup>在清廷運用輿圖繪製系統所形塑的知識／權力結構中，被視為蠻荒邊境的臺灣，只是帝國主體「凝視」（gaze）下的客體「他者」（other）。<sup>73</sup>帝國統治者集體通過視覺器官，親眼凝視新附的領土，將親眼看見的屬民、自然空間及人文景物盡收眼底，並刻意區分

<sup>72</sup> 鄧津華，《臺灣的想像地理：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（1683-1895）》，臺北市，臺大出版中心，2018 年，頁 61。

<sup>73</sup> 羅秀美編著，《隱喻·記憶·創意：文學與文化研究新論》，臺北市，萬卷樓，2010 年，頁 44-47。

為轄域內與外的地誌圖。效忠於帝國的製圖者，透過諮詢、想像或親身履勘，製造出各式的臺灣輿圖，賦予海疆臺灣多重的象徵意涵。滿清皇朝則以支配者之姿，操控「視覺性」建制的輿圖，將被「客體化」、「差異化」的臺灣予以收編、定義和再現。

## 參考書目

### 中文論著

方豪，〈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〉，國家圖書館藏「羅剛教授遺書」抽印本。  
王必昌等編，《重修臺灣縣志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113 種，臺北市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1 年。

王瑛曾，《重修鳳山縣志》，南投市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。

王庸，《中國地圖史綱》，北京市，商務印書館，1959 年。

白鴻葉、李孝聰，《〈皇輿全覽圖〉的繪製》，北京，國家圖書館，2014 年。

石文誠，〈帝國的邊陲論述——以清代臺灣圖像為例〉，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》創刊號，2010 年 10 月，臺南，頁 8-31。

石守謙主編，《福爾摩沙——十七世紀的臺灣、荷蘭與東亞》，臺北市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3 年。

呂理政、魏德文主編，《經緯福爾摩沙——16-19 世紀西方繪製臺灣相關地圖》，臺北市，南天，2006 年。

李孝聰，〈記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的測繪及其版本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 30 卷第 1 期，2012 秋季，臺北市，頁 55-85。

李約瑟，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第 5 卷第 1 分冊，北京市，科學出版社，1976 年。

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，收入《臺灣歷史文獻叢刊》，南投市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 年。

吳密察、賴進貴、莊永明等著，〈地圖與臺灣——四百餘年來的臺灣地圖史〉，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，《地圖臺灣——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》，臺北市，南天，2007 年，頁 2-35。

林士桓，〈臺灣清代方志研究——以府、廳、縣志為例〉，新北市，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9 年。

林天人，〈地圖——權力的視野、想像的空間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 304 期，2008 年 7 月，臺北市，頁 10-17。

- 洪健榮，〈知識／權力的空間——清代臺灣方志輿圖中的政治文化意識〉，《空間新思維——歷史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》，臺北市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8年，頁319-340。
- 郝曉光、呂健、薛懷平、覃文中，〈《山海輿地全圖》的復原研究〉，《同濟大學學報》29卷10期，2001年10月，上海，頁1159-1161。
- 高拱乾，《臺灣府志》，收入《臺灣歷史文獻叢刊》，南投市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年。
- 夏黎明，〈國家統治與知識生產：清代台灣地圖的繪製與區域發展〉，《海峽兩岸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》，廈門，廈門大學，2004年，頁117-139。
- 孫喆，《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》，北京市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翁佳音、石文誠、陳佳慧，《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》，臺北市，國立臺灣博物館，2007年。
-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，《美麗之島——臺灣古地圖與生活風貌展》，臺北市，國立歷史博物館，2003年。
- 莊心俞，〈清代宮廷畫家徐揚（1712~1779 尚存）筆下之乾隆武功〉，桃園市，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4年。
- 莊吉發，〈錦繡河山——臺灣輿圖的繪製經緯〉，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主編，《故宮臺灣史料概述》，臺北市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5年，頁1-16。
- 陳桂培，《淡水廳志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172種，臺北市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3年。
- 曹婉如、鄭錫煌、黃盛璋等編，《中國古代地圖集（清代）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。
- 潘吉星，《中外科學之交流》，香港，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。
- 鄧津華，《臺灣的想像地理：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（1683-1895）》，臺北市，臺大出版中心，2018年。
- 劉廷祥，《我國方志地圖研究：以明代方志地圖為例》，臺北市，花木蘭文化工作坊，2005年。
- 盧德嘉，《鳳山縣采訪冊》（一）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73種，臺北市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0年。
- 賴進貴、黃清琦、葉高華，〈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——以1878年《全臺前後山

- 輿圖》為例》，《地理學報》第 42 期，2005 年 12 月，臺北市，頁 47-68。
- 蕭宗煌、呂理政統籌策劃，《艾爾摩莎：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》，臺北市，國立臺灣博物館，2006 年。
- 艾瑞克·霍布斯邦（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）著，黃煜文譯，《論歷史》，臺北市，麥田，2002 年。
- 謝金鑾，《續修臺灣縣志》，收入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 140 種，臺北市，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 年。
- 謝英宗，〈康熙臺北湖古地理環境之探討〉，《地理學報》第 27 期，2000 年 6 月，臺北市，頁 85-95。
- 韓昭慶，〈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〉，《清華大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第 6 期，2015 年，北京市，頁 123-142。
- 羅秀美編著，《隱喻·記憶·創意：文學與文化研究新論》，臺北市，萬卷樓，2010 年。
- 吉莉恩·蘿絲（Gillian Rose）著，王國強譯，《視覺研究導論——影像的思考》（*Visual Methodologies: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*），臺北市，群學，2006 年。

## 外文論著

- Yee, Cordell D. K. "Concluding Remarks: Foundations for a Future History of Chinese Mapping." in J. B.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.. *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. 2, Book 2: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*. Chicago: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, 1994, pp. 228-231.

## 其他（網路資料）

-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，〈清朝三大實測地圖中的台灣〉，《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》地圖俱樂部，  
<http://gis.rchss.sinica.edu.tw/mapdap/?p=2874&lang=zh-tw>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-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，〈數位方輿〉，「主題單元」，『地方行政區圖』，《臺灣前後山全圖》，<http://digitalatlas.asdc.sinica.edu.tw/map.jsp?id=A103000058>（2018 年 7 月 8 日瀏覽）

- 科技部，《科技大觀園》，「飛覽古今——從古輿圖看家園」，快取版，  
<https://scitechvista.nat.gov.tw/zh-tw/PopularScience/C/8/10/1/237.htm>（2018年7月8日瀏覽）
- 張哲嘉，〈明代方志中的地圖史料〉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稿，  
<http://project.ncnu.edu.tw/jms/wp-content/uploads/2015/10/report2003ChangCC.pdf>（2018年7月8日瀏覽）
- 雍正，《硃批諭旨》，四庫全書本，卷72，維基文庫，  
[https://zh.m.wikisource.org/zh-hans/硃批諭旨\\_\(四庫全書本\)/卷\\_072](https://zh.m.wikisource.org/zh-hans/硃批諭旨_(四庫全書本)/卷_072)（2018年7月8日瀏覽）
- Jean-Baptiste Du Halde（杜赫德），*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, Historique, Chronologique,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'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*（中國帝國和蒙古地理、歷史、編年史、政治與自然情況的概述），維基百科，  
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File:CEM-44-La-Chine-la-Tartarie-Chinoise-et-le-Thibet-1734-2568.jpg>（2018年8月25日瀏覽）
- 劉亞軒，〈清初來華傳教士馬國賢與中西美術交流〉，融匯島，  
<http://rhd361.com/special/news?id=7de4f06919374d089bd87e3c12a89feb>（2018年7月8日瀏覽）
-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'Anville（唐維爾），*Nouvel Atlas de la Chine,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*（中國、蒙古與西藏新地圖），Gallica（法國國家圖書館），<http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tv1b53096745m>（2018年7月8日瀏覽）
- Jean-Baptiste Du Halde（杜赫德），*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, Historique, Chronologique,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'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*（中國帝國和蒙古地理、歷史、編年史、政治與自然情況的概述），Gallica（法國國家圖書館），  
<http://gallica.bnf.fr/ark:/12148/bpt6k54962623/f727.item>（2018年7月8日瀏覽）